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科学发展观 与中国新型工业化

KEXUE FAZHAN GUAN
YU ZHONGGUO
XINXING GONGYE HUA DAOLU

—— 理论、问题与对策

主 编 胡培兆 陈其林
副主编 林金忠 靳 涛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F424-53
H499.1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科学发展观 与中国新型工业化

KEXUE FAZHANGUAN
YU ZHONGGUO
XINXING GONGYEHUA DAOLU

—— 理论、问题与对策

主 编 胡培兆 陈其林
副主编 林金忠 靳 涛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新型工业化——理论、问题与对策:《科学发展观与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
国际学术研讨论文集/胡培兆,陈其林主编.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5
ISBN 7-5615-2605-9

I. 科… II. ①胡…②陈… III. 工业化-研究-中国-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F4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9142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

厦门昕嘉莹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6年8月第1版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7.25 插页:2

字数:684千字 印数:0 001-2 000册

定价:5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前 言

21 世纪的前 20 年,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为应对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已经存在以及即将出现的诸多矛盾、问题以及机遇和挑战,实现和完成这一时期的预期目标和基本任务,自“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依据我国的国情以及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现实,相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并将之确立为这一时期的基本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以统领、指导和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以经济发展速度为主、以不平衡发展为主(如国民经济翻番,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的发展理念或发展观的矫正或替代。但是,如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如何坚持和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则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全局性或时代性的课题。深入研究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现阶段的基本现实,把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方向,而且对中国经济理论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实际的推动意义。

基于上述认识,经过反复酝酿和讨论,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决定于 2005 年 7 月中旬在厦门召开主题为“科学发展观与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并于 2005 年初在《中国经济问题》、《光明日报》和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网站等媒体上发布会议征文公告,至征文截止期,共收到论文 150 余篇。按照征文公告所列的六个专题,即科学发展观的政治经济学解读、新型工业化道路与体制创新、新型工业化发展中我国的后发优势及其实现方式、我国的区域差异和区域协调发展、经济发展中的反贫困机制问题,会议学术委员会遴选了 60 篇论文(包括特邀代表撰写的论文),编印成册。2005 年 7 月 16—17 日,研讨会如期在风景秀丽、设施现代的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召开。与会全体代表就以上的五个专题,分七个专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其中的一些专题发言引起了与会专家的激烈争论。会议产生的影响超出主办方的意料,《人民日报》刊发了本次研讨会召开的消息,《光明日报》除了介绍一些专家的观点外,还摘要刊发了研讨会综述的主要内容。《厦门日报》、《海峡导报》相继报道了本次研讨会召开的消息。

按照事先安排,会议主办方——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要结集出版本次研讨会的入选论文。为此,我们从入选的 60 篇论文中,再选 50 篇论文,以《科学发展观与中国新型工业化:理论与问题与对策》为题,分 6 篇编辑成书。本书的序言,是著名经济学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首席经济学教授林崇椰先生在本次研讨会开幕式上的一个专题演讲稿。在演讲中,他把改革开放以来体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奇迹”归之于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并用一种名为 EGOIN 的理论及其两个组成部分,即所谓“S 曲线”和“3C 理论”,解释众说纷纭的“中国奇迹”。用这篇演讲稿作为本书的序言,是十分贴切的。

第 1 篇“科学发展观与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收录了 7 篇论文,着重探讨科学发展观

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及其与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关系和作用。胡培兆尤其强调科学发展观的学与用。他认为,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并不难,难的是做。现在强调科学发展观的现实意义在于:按现有条件已完全可以达到的一些科学发展要求因主观妄为而没有达到,造成巨大的浪费,需要纠正。既要学风好,更要作风好。科学发展观的贯彻是关系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大事,难度大、障碍多,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只有仰赖各级政府来领导实施。因为实施科学发展观的主控权掌握在各级政府手里。政府应当负起这个责任来,规划设计出具体方案并贯彻落实。

杨宝兰、徐佩华分别阐释了科学发展观中的人文理念以及对政治经济学关于“发展”内涵深化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人文理念不仅体现在“发展”观念的更新上,也体现在发展目标的转变上。杨宝兰指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文立场为根本,否则,其理论研究将偏离转轨的目标和目的。

周冰提出了新时期理论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即什么是评价经济学理论价值的根本尺度以及中国理论经济学的社会责任。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能够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如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出席国际会议并发表演讲,获得某种荣誉甚至诺贝尔经济学奖,固然值得期许,但这决不是衡量我国经济学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标准。评价一个理论的价值根本尺度是它对人类知识和思想认识影响的深刻程度、广泛程度、持久程度。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它首位的和根本的价值,是改造世界和造福人类社会即“经世济民”。在中国的现阶段,评价经济学的理论价值,首先应当看它是否能够服务于中国的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是否能够增进全民福利和国家实力,即它所履行的社会责任。

顾自安在简要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社会发展观的演进过程,分析现阶段“科学发展观”的背景条件及其基本内涵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科学发展观”做了尝试性的诠释和解读,认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心在于加强制度建设,使经济发展由制度效率提升逐渐转向结构效率提升。

王海杰就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产权制度的人本要求问题作了深入的讨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产权与以人为本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产权制度安排上体现以人为本的前提是要准确把握产权与人权的关系。产权与人权有统一性,人权是产权实现的保障,产权是人权在财产方面的体现,二者都和超经济特权相对立;产权与人权具有对立性,对立的实质是平等与效率、公正间的冲突。科学发展观的制度评价标准应该是人权与产权对立统一关系的均衡。

邹文杰探讨了科学发展观的经济伦理向度。科学发展观是在对经济增长的伦理反思中形成的。因此,在对传统发展观继承和扬弃的同时,确立了认识和处理人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等诸多关系的新的伦理标准。

第2篇“科学发展观与现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的6篇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讨论和分析了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陈其林从工业化进程中结构调整的基本要求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一个两难问题:在宏观经济运行具有明显的双约束型特征即资源约束和需求约束的条件下,由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固有的内在机制的作用,在平稳发展、缓解资源约束和需求约束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实际上的相互影响、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要缓解需求约束,由政府直接组织的经济活动虽然能创造需求(主要是投资需求),且时效性明显,但会在不同程度上激化或强化资源约束的作用,甚至导致经济过热;要缓解资源约束,现行的分配格局极有可能引致需求约束作用增强,保持经济相对平稳发展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并且可能激化现有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



林金忠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实际上是一个 TFP 能否持续增长的问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乃是基于对增长的生产力源泉的分析,此类分析的常规做法是通过 TFP 分析方法对总量增长加以分解。借助于马尔奎斯生产力指数这一分析工具所做的经验分析表明,在中国改革开放二十余年间,TFP 的增长固然始终伴随着经济总量增长,但 TFP 增长在 90 年代趋于减缓。TFP 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技术性进步,而 90 年代较之 80 年代,技术性进步已呈现减缓之势,尤其是 90 年代后期更为突出。因此,要素投入推动型的增长的可持续性、资源配置的方向性以及重视技术引进与重视充分利用国内已有技术的有效结合等问题,就具有重要的理论与政策意义。

靳涛指出,粗放式经济增长的基本成因是制度问题。我国已完成了从政府命令型经济到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但也直接导致了粗放式经济增长问题的产生和锁定。从我国经济体制转型的目标和结果来看,这一转型过程远未终结,主要体现于要素市场的二元分割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要素价格扭曲,这是导致粗放式增长的直接成因。从目前情况来看,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向市场主导型市场经济的转型仍旧是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主要目标和方向。中国只有完成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才算真正完成了经济转型,当然也只有通过这个过程才能完成中国经济从粗放式增长到集约式增长的转型。

陈雯首先介绍了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及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适用性。在讨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存在某些不足的基础上,通过对 1981—2003 年中国经济增长中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后得出结论:我国目前并不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因此,我国应该加强对环境的规制和治理,以求得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杨文进认为,一国经济在长波中的位置变化,决定其经济繁荣程度的变迁。各国在同一长波或不同长波中的相对位置及其变化,则决定了它们之间在国际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及其变化。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发达国家进行的长波转换,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战后技术为基础的传统工业化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但也导致我国工业化内部及其之上的第三产业内部出现明显的二元化趋势,同时使得我国在国际产业链的分工中处在一种十分不利的比较利益地位,这些将严重阻碍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贺晓东、李伟试图解读现阶段经济高速增长与低效率并存的种种悖论及其原因。他们的结论是: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的增长,这种增长方式的本质是“借来的经济增长”,将最终受制于国内外的资本约束。

第 3 篇“科学发展观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容,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热点问题,共收录 9 篇论文。赵振华从战略思维的高度,概括了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即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一条现代工业化、新型农业化和新型服务业三大产业协调发展共同促进的道路。市场机制是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的基本手段,传统产业会经历淘汰、保留、改造。在新型工业化的发展中,各种所有制形式都会获得发展机遇,在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各地之间可能会形成合理分工、协调发展的关系。重化工业化仍然是新型工业化的必经阶段。通过信息化的带动,走出一条以科技为先导的降低能耗、降低资源消耗、保护环境的集约化增长道路。

李海舰则从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的三大约束,即资源约束、环境约束和社会约束的角度,解读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本内涵。他认为,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必须逐步超越以上三大约束,实现从硬资源的约束到软资源的重大突破。为此,在企业层面上,努力构建以软资源为主体的经济运作体系,其核心是把企业打造成一个能力型组织。在区域层面上,努力实现以软资源为主

体的经济发展方式,包括零物质发展、零度化发展、飞地化发展和总部化发展。在国家层面上,努力转向以软资源为主体的经济运行结构。包括:从物质经济逐步转向精神经济,从大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转向有原则地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向外转移落后产业,从过分追求进出口贸易顺差转向进出口贸易平衡,从以模仿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向以创新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从以物质资源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向以人力资源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总之,谋求人与自然、经济社会、国内国外和谐,走一条以人为本、可持续性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

纪玉山等认为,发展循环经济是解决当前我国资源约束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要发展循环经济,继续走传统的工业化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加快技术创新步伐,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和绿色技术,并对传统产业实施改造,走符合循环经济发展要求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沙景华等通过对天津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总结和国外成功案例的分析,证明循环经济确实是实现经济和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发展模式,并提出发展循环经济的措施和建议。

简新华等着重讨论了中国现阶段重新重工业化的问题。他们指出,我国现在正进入一个重新重工业化的阶段。近6年重工业的高速增长是标志,原因在于消费结构的升级、轻工业的优化、农业的改造、装备制造业的加强、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城市化的加速都需要加快发展重工业,但受到自然资源、环境、就业弹性下降、增长方式、技术和制度的制约。重新重工业化不可超越,不能受到约束就因噎废食。必须真正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切实转变增长方式,以发展装备制造业为核心,发挥市场机制、技术进步、产业政策和制度创新的作用,加快技术更新改造,节约、高效利用资源,开辟更多获取资源的渠道,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职工培训,以保证重新重工业化的合理、有效推进。

傅丽芬认为,信息产业具有的高成长性和较强的扩散性,信息技术的高渗透性与减少资源耗费的特点,是实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本依据。为此,必须制定和实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相应对策。李时椿强调,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以传统产业为基础和支撑,因此,全面推进包括企业制度、产业结构、科技体制、人才机制和管理体制在内的传统产业体制创新,是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基本保障。其研究视角与以上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视角有所不同。

施本植等认为,技术制约是中国新型工业化进程中的一大难题。技术上存在的巨大差距致使我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克服技术制约以获取国际产业竞争中最关键的技术要素,中国必须在强调“自主创新”、“科技强国”的同时,积极主动地走出去,开展以技术寻求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陈爱贞着重讨论了我国新型工业化微观基础的构建问题。通过两组聚类分析,她认为,我国不同行业存在行政垄断、过度竞争和经济性垄断并存的三元市场格局,市场过度竞争与竞争不足共存。因此,市场结构从垄断竞争向寡头垄断的演变,及设置一定的规则来规范企业的市场行为等措施,是促进市场有效竞争,提升企业和产业国际竞争力,构建新型工业化微观基础的必要对策。

第4篇“科学发展观与经济比较优势”共收录了7篇论文。科学发展观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跨越式发展,因此对后发优势的探讨自然而然地成为本次会议的一个关注焦点。程恩富等探讨和分析了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在我国的应用和发展,提出应综合这两种理论,培育和发展知识产权优势的理论和战略,由此而提出了国际贸易和产业调整的一个新的视角。

沈维新具体讨论了我国后发优势的基本方面,即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科技,是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强大助推器和催化剂。经济全球化为新型工业化发展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创



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中外工业化的实践和经验为新型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借鉴。陈雅萍提出,我国的后发优势具体体现在:可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利用先发国家富余的资金,借鉴先发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借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机会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吸取国外环境污染方面的经验与教训。

孔凡保在分析金融系统功能和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金融系统发展的初始条件和政府的作用的基础上,说明了金融系统发展和工业化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认为,在金融全球化、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下,要解决工业化后发国家的金融系统落后性约束问题,必须改变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优于金融系统发展的制度安排,将金融系统的发展置于发展战略的核心地位。

李炳炎等认为,要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下实现后发优势,最重要的还在于科学理解和把握其本质,正确处理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关系,即“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加快以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加快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宋天和等提出,后发优势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所拥有的特殊优势,与其经济上的落后性共生,但要把这种潜在的优势转化为现实的优势则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是落后国家和地区追赶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必由之路,但后发优势不等于跨越式发展,前者只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他们认为,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因地制宜,结合地区、部门、行业和特点,从信息技术、科技创新和知识管理三个方面来构建后发优势,而不能脱离实际盲目发展。李晶认为,后发优势的发挥应该具备这样几个条件:一是后发国家必须积极引进先发国家的先进技术;二是国内必须培育、建立一种社会能力以充分吸收引进的先进技术,以形成一种内生的科学技术能力;三是要有合理的制度环境,使后发国家的后发意识和赶超热情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只有培育起有利于形成自主创新能力的社会机制,我国才能成功实现后发优势,也才能真正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5篇“科学发展观与区域或产业的协调发展”是本次研讨会的又一个重点专题。刘志彪等通过对苏州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回顾和数据分析,认为外资出口加工企业作为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在发展中国家的延伸,确实可以推动东道国的产业升级。但不能忽视的是这种模式也极易导致当地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失衡,形成外资挤压性的二元化发展格局。因此,必须在重视本土企业发展的基础上,努力提高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发展能力,实现传统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互动和平衡。林民书等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外商投资(FDI)对我国不同地区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通过对佛山、东莞、深圳三地的调研,他们发现,佛山、东莞、深圳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同的。佛山是以内资企业特别是以当地民营企业发展为主的地区,而东莞与深圳地区的经济发展则以外来投资企业为主。对于东莞和深圳,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密度高并已逐步主导当地经济,导致外资企业对当地内资企业的挤压,从而限制了当地内资企业的发展。

孙敬水等通过对我国不同省份市场化程度、所有制结构、开放程度三个方面的差异比较,分析了制度性因素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造成这种差异的区域政策和制度结构。周加来、晏宗新和彭安玉则结合各自所在区域(安徽省和江苏省会城市南京)现阶段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集中论述了实施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协同发展的途径,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关于中部地区崛起及其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景普秋认为,只有通过选择合适的主导产业,

打破现有的经济运行机制,形成良性循环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演进机制,才能有效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吴骏则认为,中部地区要赶超发达地区,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就必须优先发展服务业。马春辉指出,虽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经过多次调整,但区域差异仍在扩大,现在东业西移,会有助于缩小东西部的差距,但产业转移必须要求西部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条件。田学斌认为新型工业化不仅是我国工业化方式的转变,更是一种新约束。在新型工业化的发展中,区域经济竞争势必出现新的变化,不仅竞争日益激烈,而且层次逐渐深化,从资源、产业、企业竞争转变到政府竞争。因此各级政府必须为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制定适当的对策。卢丽春试图通过多种计量方法,分别从动态和静态两方面分析福建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演变和目前影响县域差异的因素,并提出实现福建省区域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发展策略。踪家峰通过广泛收集有关地方保护问题的研究材料,对地方保护的表现形式、产生及发展的原因、经济效应以及治理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和精辟的综述。

刘龙政以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在要求为视角,认为新型工业化对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节约使用资源具有极高的要求,达到和实施这一目标,不能仅仅依靠二次产业,而需要社会生产和流通各部门的合作。因此,构建与新型工业化要求相适应的现代物流体系,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坚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和要求是相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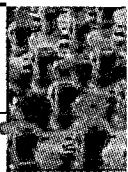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一个关键策略,在于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之间的互动。宁露涛认为,在国际经济自由化的现实背景下,大力发展IT(电子信息)制造业,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客观地看待中国的现状和外国的发展经验,把集中提高本土各种所有制类型大中小企业的科技水平和学习能力作为目标,将企业规模问题留给市场自行决定。在不违背WTO原则的三个主要方面进行IT产业政策的研究,即国有企业在产业发展中应起作用,巧妙利用WTO非起诉性资助(non-actionable subsidies)对企业资助,以及提高产业协同能力(coordination)。

与信息化直接相关的网络产业的改革方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徐华认为,我国网络型产业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合理解决“马歇尔冲突”问题,而有效竞争是解决该冲突的最佳途径。但现有的理论难以给出有效竞争的具体判定标准。因此,必须在成本可加性的基础上引进综合的成本效益分析,以成本可加性和综合的成本收益分析来共同决定市场的有效竞争程度,并据此提出了网络产业实现有效竞争的规制对策。

第6篇“科学发展观与建设和谐社会问题研究”共收录6篇论文。前3篇论文主要是对反贫困机制问题进行探讨,基本集中在“三农”问题方面。程晶蓉、柳欣从宏观经济视角探讨了我国经济和谐发展问题。通过构建一种收入—支出模型,他们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经济波动和需求不足问题给予了揭示和分析,并从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基本消费品”工业,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进一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企业破产的不利影响等方面,对解决我国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给出了政策建议。

两位外国学者专门为本次研讨会撰写的论文值得关注。Mohamed Aslam提供了马来西亚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在回顾和描述了马来西亚独立以来的工业化进程之后,他的结论是:马来西亚在第一个远景规划(1971—1990年)和第二个远景规划(1991—2000年)期间,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化和工业化同步发展,地区间的差距呈现出逐步减小的趋向。但是,贫困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尤其是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是显著的。

Dylan Sutherland以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为例,探讨了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运用问题。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造成艾滋病快速蔓延的一个主要动因,而艾滋病对经济所造成的影响及其政策含义仍需加以科学把握。按传统经济发展计量,疫疾蔓延在当前还不是



很明显。然而,从广义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念来讲,疾病的蔓延现今已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挑战。目前,广义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政策制定者们提供了从事解决艾滋病蔓延根本问题的目标。因此,这个概念必须被采纳并且应迅速地将其从抽象的概念转化成具体的政策行为。

刘根荣分析了现阶段制约农民增收的双重原因,包括农民、农业、农村的自身特性导致的内源性成因,以及农村、农民、农业自身特性以外的因素造成的外源性成因,主要指有关“三农”政策不完善,政策落实不到位。因此,需要以完善“四大体系”(即市场流通体系、财政扶持体系、金融保险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为基础,以构建和落实“一项政策”(即可持续的农业保护政策)为保障,以稳步推进“一项改革”(即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为契机,以积极寻求“三个方向”(即市场化、产业化、城镇化)为突破口的农业发展战略,以此形成农民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张庆指出,农村贫困问题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的主要问题,是阻碍将我国建设成为和谐的全面小康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村反贫困,要多管齐下,而不能只着眼于再分配领域。农村的反贫困机制的重点在于农业生产模式的改革,农业生产要实现规模集约化生产,建立相应的生产组织——农业企业。范卫萍认为,解决“三农”问题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礎。而增加农民收入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由此,她提出正收入和副收入的概念,试图寻找既适合中国国情,又能增加农民正收入和副收入的途径,从而有效增加农民收入,使社会和谐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会议的主办者,我们的初衷是为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个进行学术交流和相互切磋的机会或平台;作为编者,我们希望这本论文集能够忠实地“纪录”各位作者的所思所想。为此,我们没有对所有入选论文作文字或观点上的修改。本论文集收录的论文的学术观点,仅代表论文作者本人,并不代表会议的主办单位和论文集的编者。论文涉及的学术规范以及相关责任,由作者本人负责。

在本次研讨会圆满结束、论文集即将付印之际,我们谨向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教授、厦门国家会计学院院长邓力平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厦门大学、厦门国家会计学院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感谢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领导、各系领导和师生以及经济研究所全体师生的全力投入,尤其要感谢张玉珍、许敏娟等同志为本次研讨会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编 者

2005年12月15日



中国开放进程中的增长动力^①（代序）

林崇椰^②

20 年前的中国

差不多 20 年前，也是在寒冷的 12 月，我有幸到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作演讲。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那是一个和现在很不一样的中国。当时的绝对贫困比例仍然非常高。世界银行在那之前不久估计中国有两亿七千万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占中国人口总量的 28%。如果当时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不是在严格控制之下，中国会在全球市场中崩溃。当时的人均国民收入很低，而人均国民消费更低。消费品的供应不足，部分商品定量配给仍然存在。马路上几乎没有小轿车，人们去哪里都骑自行车。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穿着同样颜色的衣服：浅蓝灰的夹克和长裤。国外旅游者很少，并且常被人们当作风景观看。

对改革的怀疑

但当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经济变革、经济发展和经济迈向高级化的动力。邓小平先生同陈云先生和许多其他的中国领导人成功地在 1978 年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那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要改革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的方向（Vogel, 2004）。但在 20 多年前，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外部世界对初生的开放进程是否能继续持怀疑态度。难以置信的是，在那时中国和新加坡还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当时北京的演讲礼堂在寒冷的冬天里没有任何暖气，而让我和我的妻子感到幸运的是澳大利亚驻华大使罗斯·伽瑙特博士，在他温暖舒适的家里特地为我们设立了晚宴。我知道伽瑙特博士在就任澳大利亚驻华大使之前就是澳洲著名的经济学家。当我们在晚宴上互相交流思想时，他本人、大使馆的同仁和我都一致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认真的，也一定会持续走下去。当时我们这样的乐观情绪和其他大部分人，特别是中国以外的人所持的怀疑和悲观的态度大相径庭。

① 本文是作者于 2005 年 7 月 16 日在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新兴工业化道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的基调演讲。该演讲是 2004 年 12 月在海南大学题为“全球经济中的中国”研讨会上所作的公开演讲的一个修改和更新。

②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首席经济学教授，人文社科学院经济增长中心主任。

1979 年之后的开放政策

但为什么开放政策对 1979 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转型如此重要呢？首先，开放政策意味着对国际贸易，即非常重要的物质商品贸易的开放。1978 年，中国的商品出口总量仅 98 亿美元，而到 2004 年，已经增长到 5 934 亿美元。对中国商品的全球需求和地区需求为中国经济增长增加了两个引擎。中国生产的产品能迅速进入邻近的周边市场和全球市场，如日本、韩国、香港地区、东盟国家、澳大利亚以及更重要的美国和欧盟市场。产出的增长意味着国内就业机会的增多。更多的出口又带来了更多的外汇收入。这种外向型、出口导向的工业化进程大大地促进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目前中国已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外汇储备国，人民币对外的币值坚挺了许多。中国第一次不用像以前一样年复一年地为币值下滑而担心，那样的痛苦经历甚至可以回溯到 19 世纪。

迅速膨胀的出口

迅速膨胀的出口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对经济发展急需的资本密集型和高科技产品的进口能力增强。进口这些资本品对刚起飞的中国工业化进程来说是必需的。进口同时也在一种循环积累进程中大大加强了中国的制造能力。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是：当交易双方都是乐意地进行此项商品或服务交易时，双方就都会获益。因此，世界和中国都从急剧扩大的中国对外贸易中获益。据估计，在美国销售的鞋和成衣的价格因为从中国的廉价进口下降了 30%。世界银行驻北京办事处的高级经济学家 Tan Kong Yan 教授指出，到 2001 年，中国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已经超过了日本(Tan, 2005, p. 22)。

被抑制的旅游业

开放政策也意味着中国作为国际旅游业中的当代金矿的开放。对中国的风土人情以及富有吸引力的历史和地理景观的观光需求一直受到抑制，而开放政策则带来了成百万的旅游者，特别是从邻近的东亚地区来的旅游者，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看不见的出口业务。当中国的一般旅游设施，包括交通和医疗保健设施达到世界水准时，来自西方和日本的高端旅游业务将成为中国另一个重要的潜在金矿。同时，当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增加时，双向的旅游业务流动就会开始，并且现在已经开始了。中国人的对外旅游，首先是到周边的东南亚国家，然后就会到欧洲。不久之后，中国人的海外旅游将大大惠及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

外商投资

开放政策也意味着对国外资本和企业来到中国的欢迎。这项政策，同旅游业开放政策一样，是对改革前的政策的完全背离。来自香港和台湾的海外华人资本首先利用了这一新政策。目前，中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超过了亚洲其余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总和。由此，中国周边地区的国家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担忧：他们同中国相比缺乏对 FDI 的吸引力。这种担忧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本国已建成的企业被抽空了，另一方面他们自身的企业也到中



国投资以获取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低工资成本以及人民币确定会升值的好处。正如旅游者从海外对华的单向流入转变到双向的流入流出，外商投资也会最终出现双向流动，也仍然会先从周边的东亚国家开始扩展到更广的世界范围。不过这只会将在将来出现，目前只是一个可预见的未来而已。然而，无论是中国的海外旅游还是中国的对外投资都将受到人民币升值的额外推动。

海外留学

目前，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到海外留学，特别是到发达国家。然而，随着中国的社会经济越来越与外部世界融合，同时中国的高等教育设施持续地高速扩张和升级，有一天，海外留学在中国也会成为双向的。

非国有部门

对中国自己而言，开放政策同时还意味着私营部门的成长和扩展，后者在开放前的指令型经济中不存在，也是不许可存在的。因此，开放政策带来了市场导向、非国有企业的介入和价格的放开。有估计表明，以前不存在的非国有经济目前已占到整个经济总量的一半，并以公共部门两倍的速度增长。我在南洋理工大学的同事 Chen Kang 教授，在他论及改革后的中国的一本非常有启发性的出版物中把非国有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如下：

“在中国，以乡村工业企业为代表的非国有企业已经能在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与国有企业展开竞争……1984年，当所有的公社都解散之后，公社和生产队的企业被重新命名为乡镇企业(TVEs)。从那以后，农村乡镇企业几乎采取了所有他们能想得出来有利可图的方式与国有企业(SOEs)竞争，他们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

根据 Chen 教授的分析，到 1995 年，在中国的工业部门中，乡镇企业雇用的员工数量(49.7%)超过了国有企业雇用的员工数量(31.6%)。另外，中国的国有企业也越来越商业化并注重市场的供求信息(Chen, 1998)。

个体化进程

在关键的农业部门，集体化让位给了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在个体化进程中大步跃升。到 2000 年，中国不仅成为全球最大的小麦、棉花、稻米生产国，也成为全球最大的肉类、水果和蔬菜生产国。因此，在过去的 25 年间，中国不仅经历了工业革命，同时也经历了与之伴随的农业革命。有些人甚至有理有据地提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观点：中国目前制造了全球 2/3 的微波炉、DVD 机、复印机和鞋，以及“超过半数的数码相机和大约 2/5 的个人电脑”(经济学家，2004 年 10 月 2—8 日)。

实际 GDP 增长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在 1979—2004 年之间实际 GDP 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9.5%，并在可预见的将来能进一步快速增长。比较而言，中国 9.5% 的增长率是同期美国增

长率的3倍,而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图1显示的是1952—2004年中国实际GDP的增长率。在中国加入WTO,并坚定持续实行外向型、以发展为导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发 展进 程的背 景下,我 本人 预 计 中 国 至 少 还 将 维 持 20 年 以 上 的 高 速 发 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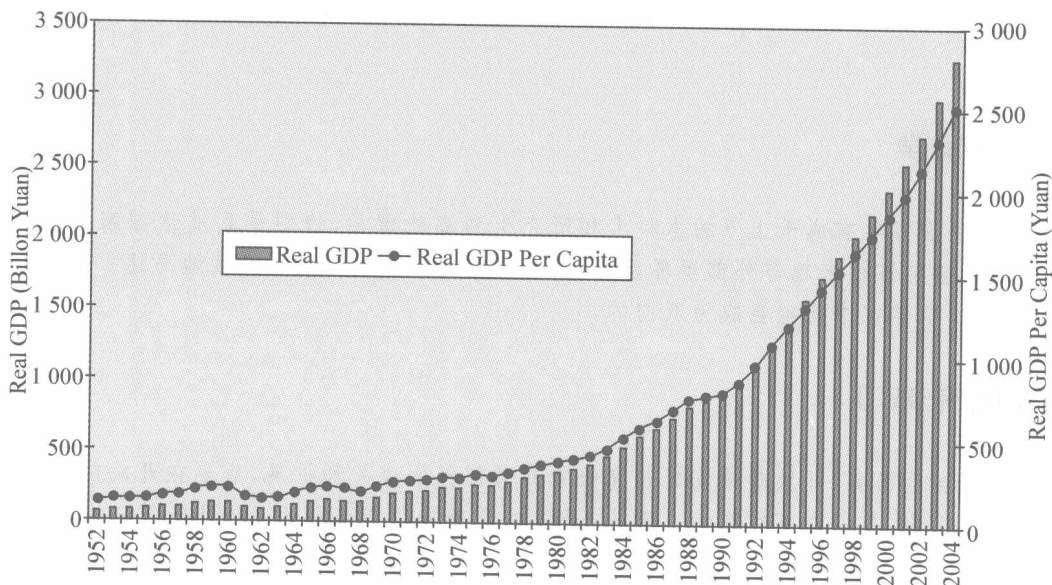


图1 按1952年价格计算的中国实际GDP和实际人均GDP(1952—2004)

数据来源:南洋理工大学的Guo Qingyang博士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网站计算,中国国家统计局。

这种史无前例的超常扩张让中国自己感到吃惊,也让全球其他国家感到难以置信。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史的实证数据表明,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许多著名的学者和经济学家,如西门·库兹涅茨,科林·克拉克,安哥斯·麦迪逊,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指出,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经济的平均实际增长率只有2%~4%。二战之后世界银行和IMF出版的统计报告也显示发达工业国家的平均复合增长率大约为2%~4%。因此,当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等地,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在40年甚至更长的时期中保持年均8%的增长速度时,世界银行1993年把这些经济体称作“经济奇迹”(世界银行,1993)。

中国奇迹

非常有意思的是,1993年世界银行没有把中国包含在“奇迹”中(世界银行,1993)。值得注意的还有以上四个创造奇迹的经济体相对而言人口规模都较小。四个经济体的人口加总也只有中国13亿人口总量的6%,即便考虑了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之后,他们的人口比例仍要小一些。毋庸置疑,4个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创造了奇迹,并仍在创造奇迹。但我们在十进制中,怎样来描述中国的经济成就?特大奇迹、全球奇迹或者仅是中国奇迹?这样的奇迹已经使中国从一个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迅速跃升为占世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GDP总量19%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中美两国间经济增长率的巨大差异继续维持下去,中国的按PPP计算的GDP会在2025年前赶上美国,而按传统汇率计算的GDP则会在2040年赶上美国。然而,我们还必须把它们折算成人均收入来看。假如现在1美元兑8.28人民币的汇率

维持不变,即便到2025年,美国的人均收入还将比中国的人均收入高4~5倍。但在未来20年内,假定美国严重的双赤字问题无法解决,那么人民币几乎很确定地会对美元升值,届时中美两个经济巨头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将会大幅减少。Tan Kong Yam教授最近预测,到2010年,人民币将会从现在的8.3元兑1美元升值到5.8元兑1美元,而到2020年会进一步升值到2.8元兑1美元(Tan,2005,p.23)。

目前,人均食物消费结构依然显示出中国大陆刚从贫困中挣扎出来:中国大陆的人均年大米消费量为154公斤,而台湾地区为80公斤,香港地区为60公斤;中国大陆的人均肉类年消费量仅15公斤,而台湾地区为81公斤,香港地区为90公斤;中国大陆人均蔬菜消费量为19公斤,台湾地区为70公斤,香港地区为78公斤。

中国奇迹如果不是让世界感到怀疑,而是感到吃惊,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来解释这种奇迹般的成就。甚至4个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加上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的经济成就也是传统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Lim,2005)。但一种被称作EGOIN的理论,加上与其相关的两个工具——S曲线和三重消费理论(Triple C),可以用来解释这些亚洲国家奇迹般的转变。理解这些转变需要把长期以来将世界清楚地划分为发达国家和落后发展中国家的方法撇在一边。

S 曲线假说

S曲线假说提出,全球有三个世界。第一是低收入水平国家世界,他们陷于低水平均衡的贫困陷阱中,也被称作乌龟经济。第二是奔马经济体世界,如中国、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爱尔兰,他们都表现出超常的实际增长率。第三是大象经济体世界,其典型特征是高消费、低储蓄,经济增长率在2%~3%的较低水平。如果中国不是从很低的基数起步,而是像美国和日本一样从高基数起步,根据S曲线假说,保持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结构和技术转变的大幅跳跃不可能发生,转向现代的生产方式和艺术的分配技能也不会发生,也就不可能从原始状态大幅跳跃。

三重消费理论

显而易见,根据三重消费理论,如果中国在1979年开放时采取保守主义、闭关自守、自力更生,只面对国内消费生产,不依靠地区和全球需要,那么也就不可能有中国奇迹了。三重消费理论假定一个现代经济由三个引擎推动:一是国内引擎,二是地区引擎,三是全球引擎。1979年以前,中国只由一个引擎推动,即国内引擎。1979年之后,中国同时由国内引擎、地区引擎和全球引擎推动,这正是中国获得高速增长的原因。据估计,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巨大,中国的商品和服务进出口总量仍然占到其GDP的75%。显然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开放的国家。比较而言,巴西、日本和美国只有30%或更少。三个增长引擎通过经济联系互相联络在一起,其中地理上的接近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同时,按照三重消费理论,三个增长引擎中,国内引擎最重要。如果国内引擎运转不良,经济增长的飞机就会栽跟斗,经济甚至一开始就不会起飞。菲律宾就是因为国内引擎运转不良,所以尽管国民受过良好教育并很聪明,但经济仍然无法起飞。印度尼西亚在1997—1998年经济危机升温时,国内增长引擎运转不良,导致了经济的急速下滑(Lim,1990)。

EGOIN 理论

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国内引擎的组成部分是什么呢？它们是 E、G、O、I、N，或者说是 EGOIN。E 代表企业家精神，指一种市场推动和市场导向型的企业家精神。G 代表政府或治理，政治和行政领导的才能和态度。O 表示一般劳动力或大众的技能 and 定位，实际上代表人力资本。EGO 综合在一起代表社会资本。I 代表实物资本投资。N 代表自然资源或自然资本。EGOIN 总的代表生产能力。可见，EGOIN 理论是多方面和多因果理论，与其他单因果理论不同。

投资和产出

显然，I 即资本投入越高，则产出或收入也就越高。更多的 I 会导致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中国在 1979 年之后 I 呈指数上升，由此产出或国民收入也呈指数攀升。同时，中国的 I 得到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补充。实际上，正如卡尔·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所说的，国民收入的增长依靠资本总量的积累，那就是我们这里说的 I。马克思说：“积累、积累、再积累，那就是摩西，那就是先知。”图 2 显示了中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正如图 2 所示，实行开放政策之前的 70 年代，中国的年均固定资产投资率为 6.8%。80 年代跃升至 13.7%，之后基本稳定在 13%。1993 年之后，FDI 占了中国国内投资总额的 10%~16%，而在开放之前则完全没有(Lim, 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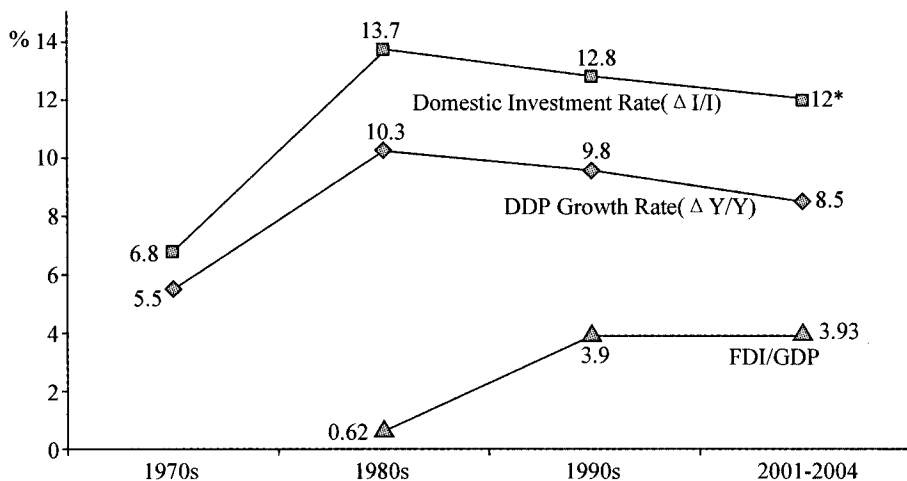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经济增长和投资的关系(1970—2004)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的数据，世界发展报告(相关年卷)。2000—2002 的国内投资增长比率为估计值。

终究资本投资 I 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是由人来完成资本的积累的。那么什么样的人能制造高的 I，而什么样的人注定就只会产生低的 I 呢？答案是：I 完全是 EGO 即人力因素运作的结果。没有 G(政府)在 1979 年发起并支撑的开放政策，中国就不会有资本投资 I 的大规模跃升。没有国内政策的巨变，也就不可能有企业家精神 E 的大规模激发。由于在经济发展过程



中相应的储蓄增长，I就有可能大规模地增加。

国民的素质

在人力资本 O 这方面，1952 年中国成年人中文盲的比例高达 80%。二战之前，这一比例更高，达到 92%。1978 年，该比例下降到 66%，而到 2002 年，文盲比例进一步下降到 9%。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从 1952 年的 49% 上升到 1978 年的 96.5%，而到 2003 年，这一比例更上升到 99%。因此，在 1979 年之前，中国的 O 已经为经济起飞做好了准备。教育发展在一种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中与经济的高速发展互为先后。中国 O 的良好发展起始于中国的觉醒，这在 1919 年北大学生在天安门为寻求现代化中国的努力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从那以后，中国再也无法沉睡或打盹，中国处于一种萌动的状态。一个又一个的革命运动给这个国家带来了精神的革命，而精神革命的种子实际上在上世纪初就已经种植了。在更早以前，拿破仑曾经警告：不要唤醒中国这沉睡的巨人。但中国最终醒过来了！直至今日，在中国那动人心魄的国歌中，仍蕴涵着盼望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不止息的呼唤：“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中国人在觉醒

中国的觉醒意味着废除抽鸦片的陋习，剪除无所不在的猪尾巴，取消妇女裹脚，消除文盲，向饥饿、营养不良、夭折等宣战，反对不人道、欺压穷人和压迫的社会，当然，也反对外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用今天比较温和的学术行话来讲，觉醒的目标是要使人们活得更健康、更长久。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邓小平先生成功地领导了中国走向开放的运动，结果是巨大的中国经济奇迹。李光耀先生对邓先生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他说，邓先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 74 岁时，他领导的变革使这个占全球 1/5 人口大国的 13 亿人民受益匪浅。

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在结束前，我还想谈一个问题，是关于两个概念的问题，即 Perestroika 和 Glasnost。当我 1979 年首次访问中国，以及后来在 1985 年访问北大和人大时，全球当时对这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讨论颇多。Perestroika 指经济改革或经济自由。Glasnost 指政治改革或政治自由。对于中国、前苏联和越南，他们可以选择同时进行两项改革或是先进行经济改革。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前苏联同时进行了两项改革，结果是前苏联的解体和经济的急剧下滑。前苏联显然顾此失彼，不能两全。

经济改革，包括非国有企业的准入、贸易自由化、农业个人承包制、生产资料的个人拥有等，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政治体制的合法性，而后者很容易在政治改革中被摧毁。中国采取了务实主义，一步一步地渐进，这种务实和渐进的做法在中国常被称作“摸着石头过河”。大家都知道，这是从邓小平先生那里引用来的。

这种渐进式的途径与 S 曲线假说所暗示的政策取向很相符，即一国政策的选取应该适合该国经济发展的特定条件和特定阶段。在中国面临的三大取向，即改革、发展和稳定中，中国正确地把稳定放在了第一位。正如领导者常说的：稳定压倒一切。如果中国领先或是跟随前苏联采取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并进的道路上，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谢天谢地，中国走了应该走